

夏洛蒂·勃朗特书信

杨静远译

文化生活译丛

夏洛蒂·勃朗特书信

杨静远译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

14.5印张 232,000字

1984年8月第1版

1995年9月北京第5次印刷

印数48,301—58,400

定价 16.00元

ISBN 7-108-00574-3/I·124

文化生活译丛

刊行者

生活·读书·新知

三联书店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印刷者

文字六〇三印刷厂

发行者

各地新华书店



Carrie Bell.

前 言

文学批评与研究要不要研究作家？要不要研究作家的生平、际遇、性格、思想，他的家庭和社会环境，他所处的时代、地域、国情民俗，一切影响着他的文艺思想、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并受其影响的事物？这问题似不难回答，但在文学批评史上却有两种相反的见解和做法，表现为两个极端的倾向。一是研究者注意力的扩展、外延，从作品本身转移到它的外围，转移到环绕着作品的纵的和横的环境和背景。在无穷琐细芜杂的考证中，文学的本体——作品——有时仿佛被自己那庞大的影子遮没而淡化了。传统的文学批评容易掉进这样一个陷阱。作为这种偏向的反动，某些现代批评流派则走向了另一极端。它表现为注意力的内向，收缩，排它。它把文学批评的放大镜只对准一部作品的“艺术”，把其他一切有关因素（包括作家）都视为不相干而加以摒弃。如“新批评”派主张用所谓“本体论”

批评来取代它所指为传记式、历史式、社会式的批评。“新批评”派理论家维姆萨特在他的《意图谬见》一文中，宣称：“要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成功与否，作者的构思或意图既不是一个适用的标准，也不是一个理想的标准。”“诗确非批评家自己的。但同时它也不是作者自己的。它一生下来，就立即脱离作者而来到世上。作者的用意已不复作用于它，它也不再受作者支配。”从这里出发，批评家把一部作品与它所由产生的母体环境割裂开来，切断它与生活的一切血肉联系，而锁闭在“纯”艺术的樊笼里。一部作品不复是现实的反映，不复是人的思想的产物，而成了批评家手术台上的一具供解剖的肢体。

我们不否认，就艺术而言，作品对作家及其背景有相对的独立性。研究一个作家，不能代替鉴赏和品评一部作品。但判断一个机体的状况，尚需考虑到遗传和环境的因素，更何况一部作品是作家精神的产品，是人的思想的凝炼和结晶。湖泊和注入湖泊的汨汨水源，又怎能截然断开呢？那种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滥用的结果，便出现了对一部作品望文生义、妄加臆测、任意理解和解释的现象，在某些现当代文论中颇不鲜见。

作品的艺术形式是不能和思想内容分开的。文学

批评当然首先要研究和评价作品本身，但关于作家及其背景的研究也必不可少。只有深入了解一个作家和他的思想，才能更深地理解他的作品。后世要了解一个历史上的人物，一般是通过各种生平资料，包括传记、自传、日记、回忆录、书信等。其中最原始而可靠的，大概要数书信。因为，传记往往反映撰写者的主观见解和意图。自传、回忆录等虽是作者本人的声音，但经过了时间的筛选过滤，事后的思考反省，去芜取精的加工过程，是提炼过的资料。而书信，除了某些有意写来供发表和留传者外，一般都是即时的思想表露，信笔书来的真情抒发，因而也最能如实反映书写者当时的思想、感情、个性的本色。

作品——思想——人，三者之间存有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。在某些作家身上，这种联系尤其显著。夏洛蒂·勃朗特就是这样一个作家。她的为人、思想和艺术，在她的书信中看得非常清楚。她的书信和她的传记一样，是英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文献，是研究这位作家及其艺术必不可少的资料，而它本身也具有甚高的文学价值，可以作为好的散文来读。

1855年2月，夏洛蒂·勃朗特正值声名鼎盛之际逝世，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深切的哀悼。赞誉

之声海潮般从四面八方涌向荒原中的牧师住宅，给悲痛的父亲和丈夫多少带来些许安慰。但有关这位作家本人的生平事迹，报道颇多讹传不实，有损于她身后的哀荣。她的父亲帕特里克·勃朗特牧师决心请人为女儿撰写一部权威性的生平传略，以正视听。他选中了伊丽莎白·盖斯凯尔夫人为传记执笔人。这个选择再恰当也没有了，因为她是夏洛蒂的好友，又是一位与夏洛蒂齐名的女作家。其结果，便是《夏洛蒂·勃朗特传》这部名著的问世。它与博斯威尔的《约翰逊传》和洛克哈特的《司各特传》鼎足而立，同为英国传记文学的不朽典籍。

盖斯凯尔夫人着手写传时，若不是手头拥有夏洛蒂本人的大量书信，是断然写不出这样一部哀艳动人的心史的。

伊丽莎白·盖斯凯尔和夏洛蒂·勃朗特的友谊是文学史上一段佳话，但这可贵的友谊尚在蓓蕾初开时就被死亡掐断，她们彼此了解还不很深。如果盖斯凯尔夫人图省事，她原可以就已知的表面材料，写一本简短的行状，也能交代过去。但是对亡友的深沉的爱，以及作家的高度责任感，使她知难而进，全力以赴去搜集资料。她跟随夏洛蒂的脚印走遍她生活过的地方，寻访有关的人，特别是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征集她的书

信。由于她的努力，这些珍贵的资料才不致散失淹没，而得以流传于世。

1857年《夏洛蒂·勃朗特传》的出版，在大西洋两岸掀起了“勃朗特热”的新高潮。早就迷上了《简·爱》的读者，现在更迷上了《简·爱》的创造者，感怀她不幸的身世，她那“极不寻常”的性格，她的两个天才的妹妹，她们那个埋藏在荒原深处的不寻常的家庭。但这部传记之特别引人入胜，不在于它的女主人公生活经历丰富多采或离奇曲折，而在于作传者多半退居幕后，推出女主人公，让她亲自向读者说话。传记以表现夏洛蒂其人为主，因为作者认为：“夏洛蒂·勃朗特作为朋友、女儿、姐姐、妻子，被人们了解得越充分，在必要时通过她自己的话来了解，她受到人们的评价就越高。”写生活的篇幅大大超过写文学活动的篇幅，作为一部作家传，这应该说是一个美中不足之处。

有盖斯凯尔夫人开路，研究勃朗特一家的专著相继出现。1883年出版了第一部艾米莉·勃朗特传（玛丽·罗宾森著）。1886年出版了勃兰威尔的朋友弗兰西斯·雷兰为他写的传。1897年出版了帕特里克·勃朗特的传《勃朗特姐妹的父亲》（W.W.耶茨著）。随之，更多的书信被发掘出来。1893年，勃朗特协会成立，不遗余力地搜集勃氏遗物。1895年，霍渥斯的勃朗

特陈列馆开幕，1923年它迁至勃朗特家的故居牧师住宅，成为永久性的纪念馆。勃朗特协会的活动则从未间断，延续至今。

到1895年时，热心的勃朗特研究者克莱门特·肖特决心收集所有的书信，出一本专集。为此他专程赴爱尔兰访问夏洛蒂的健在的丈夫亚瑟·尼科尔斯，从他得到许多珍贵的资料，包括《夏洛蒂·勃朗特传》中未收入的信件，加上从夏洛蒂的亲朋故旧那里收集到的更多的书信，于1896年出版了第一部书信集《夏洛蒂·勃朗特和她的社会圈子》（后改名《勃朗特一家和他们的社会圈子》）。这本集子中的书信不是按时间顺序编排，而是按写信人或收信人以及书信的内容分章编排的，因而不尽科学合理。例如归在“艾米莉·勃朗特”一章内的，既有艾米莉写的信，也有夏洛蒂写给艾米莉的信，还有夏洛蒂写给友人论及艾米莉的信。又如，夏洛蒂写给她的编辑威廉斯的信，则分别归入“威·史·威廉斯”、“文学抱负”和“文学上的友谊”各章。这就很难查找。另一个重大缺陷是，由于版权关系，这本集子中不包括《夏洛蒂·勃朗特传》中引用过的信件。直到1908年，传记版权终止后，肖特才得以将其中的信收进来，加上新发现的其他信件，按时序重新编为一集——《勃朗特一家：生平与书信》。肖特深

信，他已把勃氏书信收罗净尽。但是到1913年，《泰晤士报》爆出冷门，发表了夏洛蒂致埃热先生的四封“情书”。这说明搜集勃氏书信的工作仍大有潜力可挖。1932年，托马斯·怀斯和亚历山大·赛明顿合编的《勃朗特一家：生平、友谊和书信》四大卷问世，标志着勃氏书信编辑出版的新里程碑。这个集子在肖特的基础上，又增添了约三百封信，共收入1,046封，全部按顺序排列编号，从勃朗特姐妹幼年（1820年代）直到她们死后五十年（1880年代），可谓集勃氏书信的大成。尽管以后几十年中又陆续有新的发现，但它的权威性已经确立，成为任何一个勃朗特研究者和传记作家的案头必备书。

四卷集中以夏洛蒂的信为主，在全部1,046封信中约占800封。艾米莉的信只有一两封，安妮的信也不过寥寥数封，都不甚重要。因此，无论就数量和内容而言，一部勃朗特书信集，其实就是一部夏洛蒂·勃朗特书信集。

夏洛蒂是写信的能手。她的信有内容，有见地，有感情，有文采。她热衷于写信，首先是出于生活的需要。她是一个穷牧师家庭的长女。父亲无力关顾女儿们的前途。弟弟沾染了酗酒浪荡恶习，只知向家庭伸手。两个妹妹从不出头露面，一切听凭大姐安排。于

是夏洛蒂成了全家的主心骨。她从小就养成了关心全家的习惯。正是一种庄严神圣的、不可推卸的责任感，支配着她一生的思想和行动，从个人、家庭，推而及于社会。她必须为自己和妹妹的生存和发展打开出路。没有现成的社会关系可依靠，她必须自己去建立社会关系，交朋友，并长久保持友谊。为了开拓文学事业，她必须给知名作家、诗人写信求教，和出版商、评论家打交道，结交文友。在长期的幽居生活中，犹如胎儿靠脐带与母体沟通，夏洛蒂主要靠书信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。但夏洛蒂写信，更多地是出于感情上和精神上的需要。她热情，内心有着太多的感情需要倾吐。她多思，头脑中有太多的思想需要交流。姐妹三个都酷爱大自然。艾米莉心在荒原，远避尘寰，除家人外，与世无交。可是夏洛蒂还向往人间温情。她爱父亲，以近似母爱的深情爱着弟妹。她和同窗埃伦·纳西和玛丽·泰勒结为终身莫逆之交。她给埃伦的信近五百封，绝大部分保存下来，成为她的书信的主体。她给玛丽的信更富思想内容，惜未保存。成名后，她和女作家盖斯凯尔夫人、马丁诺女士、男作家萨克雷、出版界威廉斯、史密斯等人建立了诚挚的友情。她和萨克雷之间既友善，又有分歧。她佩服萨克雷的社会批判的勇气，却不满他沾染了伦敦上流社会的市侩气，过于仰权

贵的鼻息。在这一点上，她是个较萨克雷更彻底的社会叛逆。她和威廉斯的友谊则另是一样。这位正直、谦和而好思索的长者，第一个发现了夏洛蒂的才华，成为她在思想上事业上的知交。夏洛蒂给他写过不下一百封信，向他诉说自己的痛苦、烦恼和希望，畅谈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和感想。这些信是她全部书信的菁华。这些可贵的友谊，在她惨遭人生悲剧时，如同甘霖，润泽着她龟裂的心田，支持着她度过了精神危机。

夏洛蒂象她笔下的简·爱、露西·斯诺、卡罗琳·赫尔斯通一样，有一颗十足的女性的心，向往着正常的人生幸福，美满的爱情婚姻。假如她象伊丽莎白·布朗宁一样幸遇知音，可以想见，她会留下多么缠绵动人的“两地书”。然而这样的信在她的书信中却付缺如。如果有什么算得上是“情书”，那就是她写给她的比利时老师康斯坦丁·埃热的信。夏洛蒂对埃热先生的感情的性质，是传记作家们多方探究而莫衷一是的题目。盖斯凯尔所知道的肯定要多于她所写的。从仅存的四封信来判断，她的感情确已超出一个学生对恩师的爱戴。但是若断言她对一个有妇之夫存有非份之想，却那与夏洛蒂整个的为人、信念和行事不相符，绝无可能。看来，她的感情有可能是一种介乎师生情和两性爱之间的难以界定的恋情。它确乎有点超出世所公认的礼

法常规，但断然不会越轨逾矩。她要求得到每个异性的知己，一个知心，以满足她对心智、情感交融的渴望，仅此而已。如果说这是爱情，那多半是一种升高于肉欲之上的柏拉图式的爱情，她对此是问心无愧的。无论如何，这四封信的公布，启开了夏洛蒂生活中一扇迄未为人所知的门，揭示了她内心的一个密室，填补了盖斯凯尔夫人为她绘的不完整的肖像的一角。四封信之所以值得注意，在于它们显示了夏洛蒂心灵震荡的深度，有助于解释她的女主人公们那异乎寻常的激情的由来。

夏洛蒂·勃朗特的书信，贵在真实。它们不是象曾文正公家书或有些大人物书信、日记那样，专为训世和教诲子孙后代而写的。她的信，是一颗赤热的心和多思的头脑的自然流露，一个过于饱满的心灵不可抑制的外溢。她开始写信时，还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乡村少女，及至成了名，也始终保持着谦逊质朴的普通妇女本色。她的信会有朝一日披露于世，这是她万万想不到的。她谈到自己的信时说：“我从不把它们看得多么重要，也从不考虑它们的下落”。(923)^①正因如此，

① 这个数字是书信的编号，下同。

她在写信时就毫无约束，保持着精神上的自由。这些信逐年逐月乃至逐日记录了她的生活，她那虽不复杂但绝非平淡的经历。尤其是，它们有如年轮，忠实地记载了一个心灵从幼株到成材的全过程。无怪盖斯凯尔夫人在传记的后半部几乎逐页征引夏洛蒂的原信，因为她深知，再也没有比这些信札更能准确鲜明地勾勒出她的面貌的了。

夏洛蒂是一位艺术家，不是学者，思想家。她的信中没有渊博的学识或高深的哲理。她论人论事，多凭感想、直观和良知。但唯其发自内心，才更具有朴实的自然美和浓郁的个性的芬芳。这些书信帮助我们了解了这个作家，也了解了这个人。

首先是人。有不少大作家，他们创造了令人难忘的作品，但他们本人却仿佛隐身在时空的雾霭里。他们笔下的人物和景象会反复出现在我们记忆的屏幕上，而握笔者的音容笑貌却模糊不清。夏洛蒂·勃朗特不是这样的。她的形象会悄悄地潜入我们意识的深部，长住下来，象简·爱的形象一样清晰，有时二者竟重叠起来，因为她们本质上是如此相象。她是生活中的简·爱。但由于生活要比虚构更加丰富得多，她也比简·爱丰富得多。读着她的信，我们仿佛看到她由少女长成妇人，熟

悉她的一切，象熟悉一个我们身边活着的人，一个诚实、坚强、热情、勇敢、奋发向上、自强不息的妇女。

弥漫着她全部作品的巍然正气，同样也贯穿着她的全部书信。萨克雷在纪念夏洛蒂的文章《最后一幅素描》中说：“凡是读过她的书的人，谁不钦佩这位艺术家典雅华贵的英语文体，谁不钦佩这位妇女对真理的炽烈的爱，她的勇敢，她的纯真，她对邪恶的义愤，她热切的同情心，她虔诚的爱和信仰，她激越的荣誉感？”“一种急切的诚实，是这位妇女的性格特征。”读了她的书信，我们也会得到同样的印象，而且更深刻，更难忘。

我们看到她性格上相反的但并不矛盾的两面。她温柔、热情、悲天悯人。她自己遭遇不幸，深深同情一切不幸的人。“我们最好忘记自己，深切地关注他人的疾苦、损失、奋斗和困难。假如我们自己生活得称心如意，那就要时时记住，我们的千千万万同类在遭遇着不同的命运，最好让我们沉睡的同情心受到激发，我们麻木的自私心受到震撼。”(711)另一方面，她不是柔软的材料做成的。她傲骨铮铮地冷对权势，极端轻蔑厌恶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荒谬。“你们的那些有良好教养的人们，在我看来……都是头朝下在走路，倒过来看世间万物。对于他们，谎言成了实话，实话倒成了谎言；他

们把没完没了的令人厌倦的无聊活动当成乐趣，而把明智的追求视为厌事。”(279)上流社会对于她，绝不是酸葡萄。当她有机会成为贵妇人座上的贵宾时，她傲然拒绝了。(678)对下暖如春风，对上冷若冰霜，夏洛蒂就是这样一个人既软又硬的性格。

奋斗，进取，是夏洛蒂一生的主旋律。奋斗，抗争，和病弱的身体抗争，和逆境抗争，和习惯势力与陈腐观念抗争，和心灵创伤、绝望情绪抗争，和失败抗争，和死亡的打击抗争。为了实现自己和妹妹们的文学抱负，她百折不挠，不达目的不罢休。但她毫不自私。她的奋斗不是自我中心的个人奋斗。她认为，自我解放不能以损害他人或不顾他人作为代价取得。出于原则或出于必要时，她能够放弃自己所向往和珍惜的一切，作出牺牲。她坚信：“正确的道路，乃是那条要求你在个人利益上作出最大牺牲、对别人有最大好处的道路。”(257, 273)这是她的信条，是她据以律己的行为准则。还在少女时代，她就把责任看成做人的第一要旨，自觉自愿接受它的羁约。“责任，需要，这都是严峻的女主人，不容你不服从。”(38)不论在就业和婚姻问题上，她都曾为家庭作过重大牺牲而无怨尤。

妇女问题和爱情婚姻问题，是夏洛蒂思考得较多的问题，必然在书信中占有重要地位。这反映了当时

英国妇女无权的状况，也突出地表现了夏洛蒂激进的民主思想。恩格斯说过，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牍。可见，妇女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比表面看来的深广得多。在当时的英国，妇女的受压制是和工人的受剥削平行的重大社会问题。贫穷妇女特别是贫穷的知识妇女普遍找不到出路，如果没有机会结婚，就只有靠当家庭教师养活自己。家庭教师这种职业，实际上是有钱人残酷剥削有文化教养的穷人子女的一种制度。家庭教师地位的低下，劳务的繁重，待遇的菲薄，人格的屈辱，已经到了引起公愤的程度。夏洛蒂身受其苦，体会很深，因而发出强烈的抗议。她在小说中以艺术形象作了控诉，而在书信中则以社会学的精确性把这种制度的剥削本质揭露无遗。(368)

当女家庭教师固是一种苦差，但比起屠家赋闲，无所事事，靠父兄养活，在她看来还是二恶之次。她坚信，“靠诚实的劳动挣得的面包，比不劳而获的面包更香甜”（84）。独立的人格，有赖于独立的经济地位。贫穷的姑娘宁去挤劳动市场，也不要到婚姻市场上去屈辱地出卖自己。她看到一家一家的英国姑娘坐等出嫁，无目的无意义地虚度岁月，打心底可怜她们。她唯愿全英国、全世界的女子都能获得一个生活的目